

人文关怀、身份认同与诗的“真实”美学

——论新世纪先锋诗歌写作的精神伦理

刘 波

(三峡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摘要:新世纪以来,有不少诗人意识到在进行创造性语言表达的同时,自己也应该做一个富有人文关怀、有着身份认同的尊严以及强大的审美追求的思想者。正是在这种主体要求之下,诗歌的“真实”美学才有实现的可能,深度写作才会获得更大的拓展空间。由此,研究者以诗人创作上的外部环境与内在动力为基点,从文学、社会学、哲学层面来探讨新世纪先锋诗歌所呈现出的精神难题与伦理困境,以便寻找美学思想的创新路径。

关键词:新世纪;先锋诗歌;人文关怀;身份认同;精神伦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0)06-0072-09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0.06.010

Humanistic Care, Identity and Poetry's "Real" Aesthetics: The Spiritual Ethics of Pioneer Poetry Writing in the New Century

LIU B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ass Media,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Yichang, Hubei 44300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many poets have realized that they should also be a thinker full of humanistic care, dignity of identity and strong aesthetic pursuit while expressing creative languages. It is under the requirement of this subject that the poetic "real" aesthetics is possible to be realized and the profound writing would gain more space for development. Therefore, taking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internal motivation of poets' creation as cardinal points for discussion, researchers argue the spiritual challenges and ethical dilemmas presented by pioneer poetry in the new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sociology and philosophy, so as to find the innovative path of aesthetic thoughts.

Key words: new century; pioneer poetry; humanistic care; identity; spiritual ethics

在不少读者看来,作为一个诗人,只要把语言游戏玩得精彩就行了,其他皆可忽略不计,笔者不知道有理想的诗人是否真就如此写作和追求自己的美学。在这样一个需要打破“娱乐至

死”而追求严肃审美的时代,仅仅满足于语言游戏的快感,对于诗人来说确实显得单薄甚至肤浅。一个词语的敏感者,当他作为一个“社会人”时,他仍然有自己更多的独立思考,包括对

收稿日期:2020-09-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8BZW173)

作者简介:刘 波(1978—),男,湖北荆门人,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新诗研究。

家国、对时代、对与己相关的所有事物的“介入”。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真正的诗人在进行精准的语言表达的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富有人文关怀、有着身份认同的尊严以及强大的审美追求的思想者。在互联网时代,诗人的写作与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并不冲突,如何将二者结合好,并有效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正是新世纪先锋诗人们所应拥有的写作逻辑和精神伦理。针对这样一些问题,本文试图以诗人创作上的外部环境与内在动力作为基点,从文学、社会学、哲学层面来探讨先锋诗歌写作所呈现出的精神难题与伦理困境,以便更清晰地寻找突围的方式和路径。

一、从诗人的角度看待终极关怀

对新世纪的先锋诗人来说,人文关怀应该成为自身必备的素养并内化到诗人的写作实践之中,成为一种“特殊的知识”和思想伦理。如果诗人一方面要对语言负责,另一方面则要通过语言来表达时代的精神状况。诗人的诗歌可以表达现实困惑和人生难题,具有问题意识,如此方可让分行文字达至一种精神的高度。诗人沈苇说:“回归常识,回归有限的立足点,显然比诗歌上大的或概念化的谈论更加重要。一个诗人的成长过程,他具体而微的生活,经验的切身性,他的痛苦与梦想、挣扎与求索,都是重要的。再加上思想的精进、技艺的磨砺,构成了诗人的方向感。我相信,方向比超越重要。”^[1]确实如此。以前有些诗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总是认为要超越,似乎只有超越了才是进步,其实,诗人如果背离了写作的正确价值观和方向,再怎么超越,都只会越来越偏离诗歌的本质。找对方向,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是他写作能否具有不竭生命力的重要前提,可以说占据了诗人诗歌生涯的一半旅程。

当下诗人所应具有的创作方向是:回归常识。这看似简单,但要真正去践行,仍然显得困难重重。可也唯有如此,才会让写作不至于狭

隘和封闭。回归常识所带来的的是诗人在人文情怀上的自我定位,即诗人首先是一个有趣或内心丰富的人,是一个有理想和追求的公民,这是常识写作的保证。诗歌看似是情绪的产物,但它最终并不归于情绪,而是经验、感悟融合智慧之后的语言创造,这不仅关涉语言之美,而且还关涉思想之力。它既是富有想象力的情感倾诉,又是人生经验达至丰富之后理性思考的结晶,这也是优秀诗作既有感性之趣,又有理性之真的关键所在;同时,它既有小的细节支撑,又有大的灵魂境界的超迈风骨。

有的诗人也很勤奋努力地写作,但写好的标准是什么?他可能并不清楚。有好的愿望,没有明确的方向,其写作就是一场打空拳的表演。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写了一辈子,诗集“等身”,但他有可能连诗歌的门槛都未踏进。一个始终处于票友阶段的写作者,他的进步和创新到底体现在何处?这是令我们疑惑的问题。“一个人仅仅拥有好的想法并不能成为一个好的艺术家,相反,他如何理解这些好的想法才是其艺术技巧中最本质的因素。观察的能力、理解根本形式所必需的特有素质:这些是艺术家借以揭示事物基本真理的独特能力。”^[2]诗人有将诗写好的想法,但如何将写好诗的理想付诸有效实践,才是写出具有真实、深刻和创造性力量之诗的根本。

虽然有了正确的方向,但如果一味地拘泥于琐碎的现实,也无法通达更高远的境界。因此,诗人既要有对自我和时代的认知,也要有对生活与终极文明的追问。这是一种大格局,决定了诗人能在何种程度上要求自己的写作富有穿透力:在追求语言创造的前提下,将直觉与诗歌的精神伦理融合,以便打开更大的诗性空间。“以本能感知世界和生活,是一个艺术家的天性。这种感知天真、自然、准确,带着可贵的个体生命的特殊气质。令我费解的是,在诗人和艺术家群体中,这种天性丧失得太多了,满世界都是观念、概念和空想,就好像人们都得道升天

了。我想,我诗中的坚硬,乃是石头和泥土的坚硬,亦是土地之上,人心的坚硬。”^[3]雷平阳认为,诗歌写作最终要落实在大地上,而非浮于空中或停留于概念的演绎,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反思,更是自我诗学取向的定位。如何落实对诗之终极的书写?仅有沉重的修辞,似乎还无法建构一种瓷实的力量,词语要随着诗人的生活实感而得以重新组合,这不完全是设计出来的方案,它必须经由诗人的洞察来阐释身处世界的结构、矛盾与危机。也就是说,诗人在觉悟中所努力达到的应是一种命运感,这是在词语的创造中能够领略到的终极之美。池凌云有一首诗歌名为《一种诗艺》,她并未直接将这个题目处理成一首元诗,而是借助外在因素对接那些异质的形象,重塑新的虚拟现实。“发现一棵树的记忆,是不可能的。/寻找一块鹅卵石的经验/也不可能。我们窥探水的运动/却始终无法触及它的核心。/云朵一直存在,我们耗费力气/理解它的意志,却无法祈望它/泄露空中的奥秘。”所有意象都是切实的存在,但它们在诗人笔下又幻化成了精神的对应物,并构成了整首诗歌的哲思语境。

诗歌也有云朵的意志

言辞如雨水,为逃避疯狂

制造更多的疯狂。就像爱情

被写下,就失去一半纯真。

意义经过阐释,只留一层黏糊的

薄雾。没有人能做到眼明手快

捕获长久的诗意。一切完美

都存在一个黑洞。

我无法说清黑洞的诱惑。

一种寂静,带着更大的牺牲

不被光所溶解。一种晕眩

从此岸到彼岸,自由过渡。

所有的金手指都受过它奴役:

沉积岩中的色彩。黑暗中的

凝视。羞于空荡荡的行旅的羽毛

温柔地穿过锈蚀的链条

我至今不知它要去往何方。

这种诗艺是否源于阐释的诱惑,还是出于某种更为纯粹的修辞表述?池凌云并未在诗中给出答案,她让那些词语和意象重构成了异质性的言说。无论诗人作为主体要将诗歌的哲学思考置于何种境地,她还是在回避那些过于简单的抒情范式,而朝向“隐喻的复杂性”,因为“隐喻是用来使诗的表现显得生动的”^[4],它在此承担了感性和词语交互成为美的功能。当我们习惯了平面化的经验罗列,对于池凌云的表述需要打开新的视野,这是有难度的阅读。它不在于刻意挖掘超凡脱俗的崇高诗意,只是在不同于日常的表达中发现诗歌对接终极思考时的美学向度。诗人可能依托了科学的法则,但她以某种混沌的书写方式所指涉的现代性,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诗性逻辑。与池凌云这首关于诗艺的作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蓝蓝的《诺言》,她们都是在追问中和某种终极进行“诗与思”的对话。“诺言在大路上走。/孩子们画下他庄重的面孔,并恶作剧地/预留下伤口。//你蒙着面纱的未婚妻是/梦想的终结者;/你的伴郎一个叫疑虑,一个是信任;/你的证婚人是一把虚构的钥匙/深知那不存在的锁。//时间会操办你的婚礼,当你伸出/藏在身后的手:/《圣经》,或者——/匕首。”这看似是一场吃语,但并非是在梦境中发生的灵魂交流,诗歌背后有更为深沉的时代和现实场域,它通向存在式的哲学难题。“诺言”的拟人化,是诗人所精心营造的氛围,以便让我们能更快捷地进入,为此,她还运用了童话写作的技巧。而所有这些表象的美好,其实都是为后面的残酷作铺垫,诗人在此出示的精神观照,是相对于更为复杂的历史场景。由重塑美好到展现残酷,这一技巧的变化,还是源于诗人对人生的深度思考,她不可能囿于浅层次的“抚摸”,只有朝向内心

深处追问人生的来历,才是诗之大道。所以,她从形而下的婚礼,牵引出形而上的疑虑、信任和那虚构的钥匙与锁,就是试图发现“存在之难”。在单一的精神世界上下其手,有时不免是空抓一番,没有多少实际效果,这可能就是我们作为人的局限性所致,无法更为完满地在自我审视中保持深度的纯粹性。一切问题由时间来解决,此非宿命论的思虑,它就是当下的现实。我们面临的只有两种选择——信仰与死亡,这好像是二元对立的抉择,在现实中,有时存在这样的残忍,而在诗歌中,这种残忍又折射出了“诺言”背后的价值观:人生的疑难可能就在于非此即彼的选择,它是瞬间的,也可能是历经长久等待的折磨。

在此,笔者意识到诗人们在书写终极之意时会陷入普遍的幽暗,这不仅仅是历史波动与裂变所引起的后遗症,它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个体的美学。“他们用这种绝望的方式换行? /或许,我并不赞成这样。现在/我的衣衫已湿透,紧紧贴在脊背上/明天的追悼会我不能去了/我会接着写下去,换行/浮上水面透口气/直到完成这首诗”(《多雨的六月》)。盲目的诗人可能只提供口号与宣言,只有认清自己处境的诗人,才会在词语和思想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切入口,融汇一种觉悟和力道,以写出词语的真诚。蓝蓝的这种思辨性选择不一定是被动的,她可能是主动迎向了那幽暗的难度。诗人不完全是因为愤怒而产生幽暗,不动声色的,由季节性变化引起的心理反应,也能投射到文字中,构成内心对自我的抵抗。当自我飘浮、上升,这种抵抗就要求诗人沉下来,远离意识上的狂暴,将绝望转变为希望。

所有诗人书写的终极都可能会呈现不同的命运感,这也是由个体诗人的差异性所决定的。我们不可忽视这些差异性,而仅仅寻求他们面对历史与现实时的统一认知,那其实是对艾略特所言的历史意识的取消。历史的虚幻性最容易诱导诗人从终极角度进入对诗的理解,但亚

里士多德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诗人的这种预见性在于虚构本身的力量,它超越历史,而成为想象性建构的形象。“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5]在诗歌的层面上,历史带给我们的“创伤”记忆,会在诗歌中获得语言的确立,它不一定导向神秘,但是它会让“创伤”本身重新开始被激活,并延伸至某种更为宽泛的视野里。

二、诗人和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融合

在很多人看来,针对历史和现实作症候式揭示,这也许不应该当作诗人的一种责任,而应是一种经验。如何在经验的层面上理解现实,对于诗人来说更具现代性。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诗人和知识分子这两种身份如何有效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 这考验的是诗人的视野是否足够宽广,他必须从单向度的语言实验进入更立体的历史诗学建构中,如此方可称之为这个时代“无限的少数人”。就像苏珊·桑塔格评价布罗茨基超越了民族而成为一个具有“世界主义”倾向的“世界诗人”一样,“他在诗中达到那个维度,这些诗在物质标志上、文化指涉上和态度上具有非凡的速度与密度”^[6]。布罗茨基的“被迫放弃”似乎正好拓展了他的眼界,以一种“知识人”的视野观照了他精进的步伐。他们的坚守与发声,还能在这个功利化的时代让人活得有一点尊严。然而,现在有不少诗人鄙视知识分子的说法,并提出这样的观点:你要么就是一个诗人,要么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二者不可兼容。这样的说法仍然沿袭了1990年代流行的知识分子诗人和民间诗人二元对立的划分方式,带着一定的狭隘性。笔者在此所言的知识分子,是有着公民意识、担当精神和启蒙责任的知识人,而非仅仅依靠卖弄和炫耀知识来从事写作的人。

一旦诗人选择“否定的力量”,不管是在现

实生活中,还是在思想行动里,都可能体验到一种被规训的不自由或个人与时代的对抗性。诗人如何去面对这个困境,怎样去有效地处理那些身心纠结,这就需要在保持语言创造的同时,立足于独立立场和反省意识,去争取个体表达的自由。这种具有见证性和尊严感的书写,是在如今特殊的历史现实中,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理念。“如果一位诗人对社会有任何义务,那就是写好诗。他属于少数人,别无选择。”^[7]有着理想主义精神的诗人,是参与这方面行动的绝佳实践者。在普遍的“好诗主义”影响下,诗人的写作和读者的阅读,都可能被一种“远方之美”所挟持,从而变成一道“平庸的风景”。针对此现象,陈超先生说“宁可推重一些先锋诗人写的与当下历史情境密切相关的粗粝、真实、有热情、有活力,也会有闪失的作品”^[8]。这是诗人对自我规训化的一种反拨,因为在面对“精致的重复”时,外在的唯美诱惑往往会屏蔽掉“求真意志”,诗人无法在复杂的写作里保持创造性,更不可能在坚守和持续的信念中完成这趟词语的旅程。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诗人都可能是知识分子,他需要面对幽暗的内心和现实的难题,以回应时代的考验。就像诗人在与时代保持紧张关系时,总是以言说真相的方式表达觉醒姿态,有时甚至会直接诉诸即兴的假想。“除非我和我的心串供。/除非这日子是一个漫长的冤狱。/除非我的食,我的乳,我的笔和自由,遭到了非人的/刑讯逼供。除非头发脱落是为了保全脑袋。/除非血液被重新编码、改写。/除非我的嘴,触到语言的死灰。”张作梗预设了一连串可能的见闻,对“小时代”进行描绘与概括,当是为了引出更具道义感的灰暗现实。“否则,我怎能背弃我的良知,/说我不是生活在一个钟鸣鼎食的小时代。/这儿,农民被允诺种地,/渔夫可以随性撒网,/商人、白领、打工者、公务员、性工作者各司其职。/这儿,楼房覆盖天空(是为/神仙建造的居所

吗? /——唔,请允许我当庭翻供一次),/小汽车拖曳低声吼叫的尾巴,如过江之鲫。”(《小时代之歌》)诗人身处的“小时代”被嵌进了一场事先张扬的词语之旅,我们阅读的快感是否来源于批判的共鸣?张作梗只是直面了“小时代”的伤痛,而“小时代”又反过来形塑了诗人对自我良知的期待。这之间虽然也可能有诗人在身份角色上所遭遇的分裂,但他将此冲突植入到写作中,以形成微妙的反差之美。就像巴迪欧形容佩索阿那样:“他的生活是一种相对不那么明显的商业职员生活和前卫诗歌的激进主义的综合。”^[9]很多汉语诗人也处于这样的分裂与融合中,其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的游离性,即生活和写作、物质和精神的撕扯,这相互的矛盾与冲突,正形塑了一个“业余”诗人的美学完整性。

诗人的作用是什么?很多人都可能会在不经意间触及这一终极问题,而这一发问确实很现实,也直指诗的内在功能性。诗人多多也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他说,诗人“就是要通过语言,通过建立语言的存在,接近这个境界,难处就在这里”^[10]。诗人直面现实与灵魂,应对时代与社会,丰富语言与创造精神,这可能就是他全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有人认为,这实际上百无一用,可有可无。从工具理性上说的确如此,而从价值理性上来看,诗歌又不仅仅限于一种散淡的娱乐,它更多地还是促使人达到一种“向道”(多多语)的境界。由此观之,诗人就是这个时代理想主义的坚守者。当网络上出现那么多话语暴力,权力过分集中到少部分人手里,以及诸多不公正与贪腐行为,让清醒的民众无法忍受,这时需要有人站出来表达意见,站在公共价值的立场上来谈论现实。于是,宽容就成为了很多人的选择。然而,宽容不是没有底线的,它应该是站在人性基础上的宽容。当年胡适提出自由与宽容,其实也是基于人性方面的考虑,更多是富于建设性的意见。

在这一意义上,诗人也可以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在此转型年代尤其重要。他们的

存在提醒我们要关注常识，常识对每一个人的启蒙，都是让生活公正有序，只有这样，爱与善意才会挽救这个时代的道德沦丧。毕竟，诗歌是理想主义的产物，诗人正是这种理想主义精神的守护者，他们站在人性的角度，用语言和更丰富的生活进行对话。

它的某些情节总试图

卡住我：楼梯，药片，椅子，或者通过
只有背影的人抛来的救生圈……

我停顿。生活不停，在光滑的书脊上
滑动。

有时候是风，催促书页飞快跳动，想看看
怎样的命运在前方等我。

而我并不着急。

——我喜欢在紧要关头

抽出身来，回到过去某个留有折痕的地方，
在遥远的叙述者的口吻里，重新辨别：

哦，那么多词，

沉默，并且正深深陷在那里！

胡弦的诗歌《阅读》展现的其实是人的精神世界里的疑难与行进障碍，阅读之旅是跟随他人的命运之旅，也是自我的精神之旅。在阅读中，肉身的疼痛也由心生，而内心的闭合，关乎灵魂朝向更开阔的世界所具有的价值，这是现实存在的依据。在诗人笔下，阅读的丰富性不是由诗人的阅读过程来呈现，而是由与其相对的贫乏来反衬。“那么多词”是一种见证，但是在这样的多元与丰富面前，“沉默”才是归宿。诗人这种阅读代言人的身份是否合法，皆在于疑难本身的高度与深度，他如果越过了那道障碍，一切可能都会重现光明。然而，现实中的阅读，我们又有多少人能真正走出那“精神缠绕的怪圈”，不是深陷其中，就是无法真正进入，站在

文本的外围，这种阅读更像是围观，或许宿命感就是这种阅读的终极之境。胡弦在此找到了自己作为知识人的身份认同，阅读虽然不能完全改变这种身份意识，但它能维护知识分子的敏锐性。对于同构于知识分子群体的诗人来说，身份认同是保持立场的重要前提。当然，公共知识分子身份一般来说是他者认同，而诗人身份更多的其实还是自我认同，没有多少人将诗人当作一个正式的职业和身份，他们的理想主义在很多人看来就是自说自话，无法形成对公众的启蒙效应。他们的发言往往能对这个社会产生推动作用，这也是很多人认同公共知识分子而对诗人身份不太感冒的缘故。但在笔者看来，它们在同一个人身上可以并行不悖，甚至可以互补，且能保持一种更为有序的坚守。

有立场的诗人也未尝不可以是一个“反对者”，这样他们的视角至少不会因为太过世俗，而最终被淹没在大众文化的狂潮里。不少人的脱颖而出，其实不仅依赖自身的写作经验，更多时候还在于他在革新的路上能走多远，走多久。在审美的意义上，诗人的合法性取决于他面对时代的选择，他可以是某种秩序的拥护者或反对者，皆取决于在这种秩序里他持有什么样的立场。“文学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自我阐释的机器，也是使生活重新诗意化的机器，它能够将日常生活的所有废料转变成诗歌实体和历史符号。”^[1]文学对时代的消化能力看似体现了诗歌的功能性，其实对于诗人来说，这不过是一种梦想的可能，它必须在秩序里获得验证。如果诗歌完全臣服于意识形态的规训，在革命年代从属于政治，在消费年代依附于金钱，而并无自己的恒定原则，那么，这种秩序很难永恒守护。清醒的诗人多为这种秩序的反对者，他们的语言创造带着批判和审视之意，而最终透露给我们的，可能是悲悯与同情，因为所有的批判、审视，都是基于常识性的爱与善。

所以，笔者在此提到的诗人与知识分子这两重身份在同一个人身上得以融合，其最终目

的还是立足于爱与善的创造。不管诗人用什么样的话语方式进入诗歌,也不管他要改变的是怎样一个堪称腐朽的语言机制,他的写作,既需要让读者看到文学审美的世界,又能从中明晓我们这个时代的肌体。只有如此,两种身份的融合,才会有丰富的交集,才会显得更有力量。

三、诗歌的“真实”美学是否还有可能

在网络时代,诗歌的敌人终究还是诗人自己。诗人持有什么样的写作态度,就决定了其认知的眼界和视野,同时也决定了他诗歌的广度与深度。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解放自己,让自己既能够将思维和想象放飞,又能把创新和精彩收回,而不是作茧自缚地满足于模式化的“宏大抒情”。经验必须内化于创造的逻辑里,才可能有多层次的诗意展现的空间。虽然设想在一条既定的轨道里赋予诗歌以真实性,可在实践过程中,诗人所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尤其是针对现实的描绘和陈述,有时也难免通向抒情的虚无。

一个诗人笔下的虚无精神,可能就源于他在生活与写作中的游离态度,如何朝向一个聚焦点用力,关涉诗人的诗歌美学。有的诗人靠感性获得诗意,而有的则用理性克制激情;有的诗人存尖酸刻薄之意,而有的则有温柔敦厚之美。诗人的写作是什么样的风格,与个人的性情有关,也取决于他向什么样的境界敞开自我胸襟,同时,也取决于他自身的经验积累与思想情怀。确实,有不少诗人滥用自己的情感,不懂得节制,以为诗歌仅仅就是个人的激情释放,就是完全依靠情绪带动词的流转,“诗人所以能引人注意,能令人感兴趣,并不是为了他个人的感情,为了他生活中特殊事件所激发的感情。他特有的感情尽可以是单纯的、粗疏的或是平板的。他诗里的感情却必须是一种极复杂的东西,但并不是像生活中感情离奇古怪的一种人所有那种感情的复杂性。……诗人的职务不是寻求新的感情。只是运用寻常的感情来化炼成

诗,来表现实际感情中根本就没有的感觉”^[12]。艾略特所言的“复杂的东西”,是常态生活中的情感在诗里的“化炼”,它在于诗人作为写作主体所执着的心智的锤炼。而真正经典的诗作里,有理性的参与,也有克制的情感,能有效地运用自己的心智,当为写作的重要策略。诗人的写作如何让人信任,其实往往不是靠一首诗,而是其整体的文本与观念。这样,我们判断一个诗人是否优秀,更多还是取决于他的语言创造和精神气场在何种程度上让我们产生共鸣。

张执浩有一段话,准确地道出了诗人与诗人之间的区别,而且他将这种区别作了明晰的划分:“所谓诗人,其实是这样一种人:在思想(感觉,包括见闻)与言说之间,他(她)是最为统一的人。想到,看见,然后说出。诗人与诗人的差距仅仅在于言说的准确性,因为世界尽管神秘,但并不深奥,任何一个常识被恰到好处地指认出来,都能使人惊心动魄。诗人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缩短思想与言说的距离,在混沌、嘈杂的生活现场,一次次划亮火柴或者闪电。”^[13]要缩短思想与言说之间的距离,对真实美学的追求就会成为写作的第一要义,否则,我们还是戴着面具在走向危机,而自己浑然不觉。“远山是个大家伙而近丘不是/父亲握锄,我执笔/侄儿开来铲车、挖掘机/坟墓是个大家伙,而容忍它的菜地不是/在盛夏,在正午,在一个人失踪八年/又突然宣告她根本没有离开之意时/泪水是个大家伙/而汗水不是/岩子河流经太平洋、天空,又重新回到岩子河/它们都是大家伙/我也是/我得到了自由、名利、孤独和空虚/我用电脑写作,可书桌上摆满了笔/无数次被践踏,无数次/反弹,我正在过我不想过的生活。”(《大家伙》)这是生活的真相,诗人只负责说出,并赋予它诗的形式与逻辑。我们从中读到的不仅仅是生活的真相,也有一种实感的情怀,从看见到说出,这里面到底隐藏了诗人多少难言的秘密?

由此观之,诗人一旦成为时代的“旁观者”,他需要面对真相来言说时代何为,否则也就无

法看清眼前之事,包括自己的内心。那么,诗人要从最基本的感觉出发,从最平常的事物里寻求表达的声音,因为写作一旦玄学化,最易陷入“词的混乱”。我们在笔端不仅打量别人,更要打量自己,拷问内心深处和精神世界的虚荣与暗淡。诗歌并不反对常识。一个诗人有着与众不同的奇思异想,那是他写作的基础,也是其优势所在。有时,诗人必须跨越对生活的直接描绘,去寻找生活之上或生活之下的那一部分,或许那才是诗歌的灵光一闪之处,我们需要捕捉到它们,从而给我们提供作判断的方向感。在诗歌与新闻的区别上,米沃什曾提到过:“诗歌的见证要比新闻更可靠”,诗歌能见证什么?事实、人心以及我们的精神。“如果有什么东西不能在更深的层面上也即诗歌的层面上验证,那我们就要怀疑其真确性。”^{[14](P16)}诗歌在此成了一种比新闻更富有深度的参照物,它可以是一种判断标准,不仅能见证我们的时代,而且能验证事情的真伪。因为诗歌相比于其他的文字来说,或许更少功利性,更显得“无用”。在一个“无用”之物面前,一切虚伪和假象都会现出原形。在此意义上,诗歌其实就是一种常识。

在先锋成为“政治正确”的时代,前进是一种方向,而后退同样也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路径。处于多元写作语境中的诗人,往往无法规避被某种唯一的方向所引领,一切全在于他怎样去认知方向背后的常识。真正尊重常识,对生活 and 词语进行提纯,才是诗人写作的利器。立足于常识,正是思想性写作的根基,这种常识要求诗人的内心必须真实,情感的力道运用恰如其分,才可能获得更丰富的诗歌美学。我们所尊崇的诗歌美学到底是什么?是恶还是善?有独立立场的诗人,会在内心为自己确立一个标准。写恶的目的不是为了展示恶,而是从另一方面展示一种善。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在回忆录中说:“诗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原谅,唯独一定不可能做诱惑者,不可以利用他的才能使读者相信某种非

人性的意识形态。”^{[14](P93)}作为有良知的诗人,我们有必要为世间提供美好,但提供的方式,并不是只肤浅地颂扬,而是要触及灵魂的深处。那些看似丑陋的灵魂,我们是不是应该辨别它表面的丑陋下是否暗藏着真正的美?诗人可以大胆地写出一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也可以勇敢地道出个人和周遭社会的难言之隐。写作的目的,有时就是彰显我们在现实中难以把握的事情,写出一种疑难、困惑,确立一种自由的精神、一种独立的立场和价值观。

以此观之,写作的奥秘,其实都在于言说:怎样言说和言说什么。诗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它更能代表诗人和语言之间的那种矛盾、纠结、融合与最终落实。有些诗人的表达能让我们的灵魂得以扎根,而有的诗人在语言上的乏味,也会展示文本自身的无力感。诗人们追求什么样的表达,才能超越内心趋于平庸的惰性和无聊感?还是要看他们怎样理解诗歌。“好的诗歌总是伴随着一种发现,是在对时代感应基础上对个人生存状态的发现,对艺术风格、趣味和手法的发现。诗歌写作的个人化特征似乎日益受到重视,但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个人的情感要与普遍的经验相通。”^[15]诗歌不仅要发现个人趣味,同样要尊重普遍的经验,这样才会有综合的诗意产生,它直指诗歌的真实性传统。很多虚伪的美学给诗人带来的是麻木,而给读者提供的是真相被遮蔽的场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诗人也必须经常扪心自问:“可是,我所写的东西的确是真实的吗?”——这不一定意味着:“它在现实中是如此发生的吗”^[16]?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到了诗人笔下,会经过诗意的转化,但这种转化不是扭曲和无节制地变形,而是一种经过诗人内心过滤后的精神释放,它们一定是由心性自然流露出来的,并非完全的“硬写”。没有经过灵魂的洗礼,硬写出来的诗歌,很难令人产生共鸣,因为它没有在文字中解决精神上的难题。

在写作中,不试图解决一些精神上的难题,

很多人就会思维钙化,文字没有灵性,要么是迟钝、麻木,要么是狡黠、功利。一个完全靠才气写作的诗人,很难在个人经验之外保证持续写作的有效性,他必须要在时代与生活融合的基础上对诗意重新进行“命名”,让诗歌有时代的精神底色。“诗不单是词语的交流,也是物质活动和效力的场域。更确切地说,唯有在物质活动和效力的场域的意义之上,它们才是词语的交流。”^[17]也就是说,语言创造必须联于时代的现场和细节。在精彩表达的基础上增加思想性,成为时代、生活与诗歌互动的重要途径。而实行的方式,即写出内心的真实。诗歌可以想象,可以虚构,但一定不可以谎言连篇。米沃什曾把诗歌定义为“对真实的热情追求”^{[14](P57)},这是对诗歌本质性的定义,不管是抒情,还是叙事,诗人的写作实践最终都离不开真实,它既是情感的真实,也是语言的真实。

我们有时不妨像米沃什那样做一次彻底的追问:诗歌是否还有可能?如果诗人写诗的意义仅仅是发泄情感或玩纯粹的语言游戏,在这个时代其写作的意义就可能被悬置。因为在一片混沌中盲目地写作,那样没有追问和反思的实践,终究也不过是一场徒劳的狂欢,它不足以成就一个诗人全部的努力。

[参考文献]

- [1] 沈苇. 何谓现实与物质的超越? [A]//吉狄马加,主编. 现实与物质的超越 第二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诗人作品集[C].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209.
- [2] [英]雷蒙·威廉斯. 文化与社会 1780—1950[M]. 高晓玲,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150.
- [3] 雷平阳. 枯水期的诗歌写作[J]. 当代文坛,2009(6): 41-42.
- [4] [德]黑格尔. 美学(第2卷)[M]. 朱光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30.
-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诗学[M]. 陈中梅,译注.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81.
- [6] [美]苏珊·桑塔格. 重在所在[M]. 陶洁,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391-392.
- [7] [美]约瑟夫·布罗茨基. 小于一[M]. 黄灿然,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311.
- [8] 陈超. 先锋诗的困境和可能前景[A]//陈超. 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40.
- [9] [法]阿兰·巴迪欧. 世纪[M]. 蓝江,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164.
- [10] 夏榆,陈璇. “诗人社会是怎样一个江湖”——诗人多多专访[N]. 南方周末,2010-11-18.
- [11] [法]雅克·朗西埃. 文学的政治[M]. 张新木,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39.
- [12] [英]艾略特. 传统与个人才能[A]//陆建德,主编. 艾略特文集·论文[M]. 卞之琳,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0.
- [13] 张执浩. 诗说[J]. 诗选刊,2012(2):93-94.
- [14] [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 诗的见证[M]. 黄灿然,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15] 张曙光. 我所理解的诗歌[A]//臧子,主编. 诗建设(创刊号)[C].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23-24.
- [16] [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文化与价值[M]. 涂纪亮,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59.
- [17] [英]特里·伊格尔顿. 如何读诗[M]. 陈太胜,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33.